

陈炽维新思想散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98 级基地班 刘 君

—

陈炽 (1855 ~ 1900 年), 江西瑞金人。1882 年中举, 1886 年考取军机章京, 长期在户部任职。虽位卑而强国之志与日俱增, 周游全国各地, 留心天下利病, 潜心钻研中西各国学问。于 1894 年撰訖《庸书》, 详尽叙述改革思想。1896 年, 重译英国人斯密德之《富国策》, 由《时务报》连载后, 反响热烈。此后, 又在这一基础上撰写了一部经济专著《续富国策》, 以求中国踵英之后而富强寰宇。

陈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后, 认为惟有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最为理想, 他称君主立宪之国, “有上议院, 国家爵命之官也, 有下议院, 绅民公举之员也, 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 事之或行或止有定论, 人之或贤或否有定评”,^① 又称这种“议院之法”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② 于是他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提出议员“必列荐绅方能入选, 县选之达于府, 府举之达于省, 省保之达于朝, 皆仿泰西投匭公举之法, 以举主多者为准, 设院以处之, 给俸以养之”,^③ 要求设立上、下议院。他相信, 只有这样, 才能“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 “即敌国外患纷至沓来……能胜而不能败, 能败而不能亡。”^④

除了改革中央政权机构以外, 陈炽对地方政权机构改革的论述更为精辟, 他提出地方采用“乡官制”, 称“各府州县仿外洋议院之制, 由百姓公举乡官, 每乡二人, 一正一副……每任二年, 期满再举。”^⑤ 又称“乡官制”有四大优点, 即为国家养人才; 为民间谋乐利; 警贪邪; 情上闻, 尽通壅蔽。^⑥ 陈炽的乡官民选制度相当于西方议会制度的地方议员民主选举制度。这样从中央到地方, 就构成了陈炽的一整套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设想。

这一套改革设想显然反映了早斯资本主义迫切要求参与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以保护其经济利益的愿望, 以及用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来改变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构想。

二

陈炽在政治上追求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源是为了在中国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 他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精髓, 也是维新人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典型代表, 既具独特的个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共性。笔者试将其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作一比较研究。

陈炽与郑观应对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束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都表示极为不满。为挽救民族危机, 解除封建势力束缚, 抵制列强经济侵略, 富民强国, 二人所提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措施, 大致相同。

第一, 设立商部。郑观应提倡从中央到地方, 设立专管商务的机构, 制定商律, 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陈炽在《庸书》中同样主张“仿泰西各国, 增设商部”,^⑦ 并制定商律, “以泰西商律译出华文, 情形不同者量为删改”,^⑧ 从法律上来保护商务和商民。

第二, 发展机器制造业。郑观应认为“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 往往格外居奇, 要求善价, 且多以用过之旧物, 售之中国, 而中国暗受其欺。……偶有损坏, 仍须请洋人修理, 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⑨ 他主张, 中国必须尽快设专厂制造机器。这样“各种机器自能制造, 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 所造之物既便自用, 且可售于人, 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⑩ 陈炽则从洋货出发, 推演道“洋货之来也, 皆以机制, 而后能夺我利权; 则我之仿造洋货也, 亦必以机制, 而后能收回利权。……惟物物即须机制, 而中国独不能制机, 生利收利之机关转悬于他人之手。”^⑪ 同时, 陈炽还指出, 如果向外国预定机器, 那么费用昂贵还是其次, 重要的是长途运输时间的耽搁将导致商机的错失, 使得“向之必能获利者, 今已无利可图。”^⑫ 他明确指出“中国不能制机, 中国之工商即永不能力争先者也。”^⑬ 也就是说, 发展工业是国家致富的根本。只有发展工业, 物品不依靠进口, 然后才有可能“行销外洋”^⑭, 挽回中国的入超现象。这一点表明陈炽已经能够认识到用经济杠杆来推动民族工

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三，大兴矿政。陈炽大兴矿务的设想根本上是为了解决白银流失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要与西方的金本位制接轨，避免白银大量流失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则势必“广铸钱文”，“欲广铸钱文，必大兴矿务。”^⑮而郑观应则把开矿视为开辟利源的重头戏。他认为“欲图富强必先开矿”，^⑯“如果不兴矿务，则必然“徒增外人之垂涎”。^⑰

第四，裁撤厘金，增加进口关税，撤去海关洋人，收回海关管理权。郑观应称，对土货出洋，“税宜从轻”，至于厘金“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⑱由于列强经济侵略的步步进逼，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陈炽除了主张增加进口关税、减轻出口税以及收回海关权之外，同样也极力要求裁撤厘金。他认为厘金制度使“商情困苦，市肆萧条……百物滞销，四民俱困”，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通商而后不可不及裁者”，^⑲是也。

第五，设立银行。陈炽根据西方的资本运动经济理论，认为“商才不能积也，通而已矣。”^⑳然而资本的运作没有银行这一金融机构作基础是相当困难的。他在《续富国策》中列举了设立银行的六大便利，以论证银行在国际国内商务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郑观应认为，银行不仅能使“出洋华商可以汇兑”^㉑而且一旦“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还可供“随时通融”。^㉒因此“银行之盛衰关乎国本”，^㉓广设银行，裨益甚多。

上述诸条只是两位经济学家思想精髓的一小部分，从中大略可以看到他们的时代共性。郑观应的维新思想集中反映在1884年成书的《盛世危言》中，该书早于《庸书》、《续富国策》十年，陈炽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受到他的影响。陈炽于1893年曾为《盛世危言》五卷本作序，^㉔表示了对该书的赞同与高度评价。

此外，在他们的思想中明显地可以看到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子。陈炽在《续富国策·商书》之“创立商部说”中提出“假使无商，何以有税？假使无税，何以济用？假使无用，何以为国？”^㉕郑观应的重商主义思想则是学术界早已证明的。^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以及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压制，使民间资本要求发展新式工商业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控制——维新派的经济思想中重商主义的倾向正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从小农经济的重本抑末到对西方重商主义的崇拜与追求，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是传统文化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冲击的一种表现。陈炽等进步人士敢于开风气之

先，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外，还需要有无畏的勇气和魄力。

三

除了重视工商业以外，陈炽对于农业仍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由于长期担任户部职务，并对中国广大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陈炽对小农经济的弊端了解得十分透彻。他认识到由于近代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源于农业这个部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此，对于农业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是交换价值，财富完全从商业产生出来，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真正的源泉；重农主义则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随着后一思想在中国的深入，进步人士对农业的论述逐渐加强起来，郑观应、康有为、严复等人，都论述到了工商与农业的关系问题。但能够明确提出农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具体关系的，却只有陈炽。他把自己对于中国农业、农村状况的了解，对照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发现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的格格不入。从而提出了以西方先进农业科技改造中国小农经济的主张。

陈炽首先提出了农业生产是“富国之源”的思想。他比其他维新派人士更加注重探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述，这是他的经济思想中较为深刻的地方。陈炽认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闳，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㉗其中“本”、“源”、“体”三个概念很好地说明了商业、农业、工业、矿业之间的关系，流通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生产部门是物质财富的来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然，陈炽对农业的重视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的农业学不是专门以农业问题为其学说核心的，而是以各自特定的哲学范畴为其重点要意，而陈炽则更多地偏重改造农业本身。他把目光投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倡学习西方先进农耕技术和农业科学，同时又结合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融贯中西，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农业科学，并在全中国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和普及，以求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从而达到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陈炽除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特别重视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状况，他提出“地力之肥瘠，树获之多寡，统视人工之勤惰为

差”^②他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农业部门放在首位，充实加强这部分的农业劳动力，从而摆脱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为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奠定基础。

四

陈炽的一生是在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度过的，洋务运动传播的西方文明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洋务运动带来的开放环境。然而，陈炽却没有对洋务运动表示出多大的支持。相反，他的《庸书》在1894年由翁同龢举荐，呈献于光绪帝御览，并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参考书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陈旭麓先生之所以把洋务运动的所有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的变化称为“近代化的一小步”，^③也就是因为洋务运动毕竟不是产业革命，它充其量不过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以模仿一部分西方的器物来捍卫旧有的秩序，结果只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④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地位。也就是说，陈炽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遵从祖制的可能，它必须进行一场制度上的革命。中法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的弊端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察觉。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到富强的本原，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这样，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明显的判若两家了。

注释：

①②③④《庸书》“议院”，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版（以下称《陈炽集》），第107—108页。

⑤⑥《庸书》“乡官”，《陈炽集》，第17—18页。

⑦⑧《庸书》“商部”，《陈炽集》，第79—80页。

⑨⑩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三，“商务五”，第19页。

⑪⑫⑬《续富国策·工书》“制机之工说”，《陈炽集》，第224—226页。

⑭《庸书》“考工”，《陈炽集》，第83页。

⑮《续富国策·矿书》“维持矿务说”，《陈炽集》，第179页。

⑯⑰《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矿务上（附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以下称《郑观应集》），第712—713页。

⑱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税则”，第3页。

可以推断，洋务运动的发展为维新思想产生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从洋务到维新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当中的三十年，人们的观念逐渐地变化着，洋务派本身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维新思想正是在此时从洋务思想中分化剥离出来的，是一个从零碎走向系统的过程。也可以说，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一样都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列强入侵的步步深入而发展，都是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潜伏地走向更深刻的激化而发展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承继和扬弃的关系。

五

当然，在陈炽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影子或者说是局限。在他的《庸书》中，每论述一个主题，就必先引出上古、秦汉时的范例，一概必是中国原先早就有了的，然后必是因为什么原因荒废了，以此说明西方的一套方法措施，实际上跟中国古代文明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西方，来回复三朝盛世。陈炽的这种思想可能受到薛福成“西学中源”说的影响。这种字里行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在相当程序上反映了时代的动态，是对现实矛盾与激变的特殊回应。维新派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在很大程序上还必须借助传统思想的工具为资产阶级维新活动服务，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主张，削弱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力。

⑲《庸书》“厘金”，《陈炽集》，第27—29页。

⑳《续富国策·商书》“创开银行说”，《陈炽集》，第262—264页。

㉑㉒㉓《盛世危言》“银行上”，《郑观应集》，第679—682页。

㉔《〈盛世危言〉序》，《陈炽集》第305页。

㉕㉖《续富国策·商书》“创立商部说”，《陈炽集》，第231—233页。

㉗见何支瑜，《试论郑观应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商倾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124—126页。

㉘《庸书》“农政”，《陈炽集》，第26—27页。

㉙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05页。

㉚杜威语，原本用于形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李时岳先生引此语描绘洋务运动时的社会状况，认为甚佳。